鲍德里亚缘何误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何云峰　王绍梁

(上海师范大学 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　要: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所依赖的概念,诸如生产、劳动、价值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效力,因为这些概念依旧没能突破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而陷入了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镜像之中。因此,鲍德里亚对劳动力、劳动二重性、劳动与自然、劳动与需要、劳动与自由、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展开了系统的批判。鲍德里亚误解马克思的根源主要在于:一是缺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内涵的准确把握,二是忽视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维度,三是混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最终在革命路线上走向消极的象征交换理论,即采用"暴死"的方式来抵抗抽象劳动的符号化及其对人的控制。究其根本,是因为鲍德里亚在理论基础上拒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对人的统治,给出了扬弃这种抽象劳动的科学方案。马克思不仅把劳动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即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会创造出否定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关键词: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存在论;抽象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 089.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6-0026-11

"劳动"是联结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性概念,因而对劳动概念的批判直接威胁到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在近代思想史上,有两位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展开过系统性批判。一位是社会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把马克思对劳动的"重视"斥之为劳动拜物教;另一位与阿伦特遥相呼应的是后现代社会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如果说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一种政治哲学范式的,那么鲍德里亚则采取了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并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中寻求一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革命路线的颠覆和改造。马克思真的陷入"劳动之镜"了吗? 鲍德里亚"在何种意义上"误解了马克思?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在学术界的影响延续至今,这进一步说明了从马克思的存在论和劳动批判理论本身来回应这种批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误解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误解可以从其"劳动—生产之镜"中窥见一斑。鲍德里亚所谓的"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即马克思的劳动、生产、价值等概念仍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延续和深层认同;二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镜像。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劳动概念以及由这一基础概念所延伸出来的需要、自然、自由等映现出根植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进而蕴含革命的劳动-生产辩证法也未能逃出资本的抽象统治。

收稿日期: 2021-04-12

作者简介: 何云峰,男,重庆市人,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项目编号:2020WXB004)阶段性成果。

(一)劳动力批判: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

鲍德里亚批评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概念有一个十分巧妙的定义:“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①马克思把“劳动”等同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鲍德里亚清楚地看到劳动力概念构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秘密起点,当马克思把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引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时,“劳动”才能够进入循环生产的体系中,并创造出商品的“价值”。鲍德里亚提出,对消费概念的激进批判必须延伸到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才达到其全部视界,因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把劳动力看作‘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动力抽象操控的彻底表达:资本的真理在这种把人看作价值生产的‘根据’中达到了顶点。”②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仍然保持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倾向,把使用价值的具体确定性看作政治经济学结构的具体前提,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产生于使用价值。这就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积累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例如一般的经济学就是把产品的有用性看作对需要的满足。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地方正在于此,因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作为批判起点的错误正在于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③。即是说,使用价值也是作为符号被创造出来的,为了追求交换价值的实现和积累,多样化的使用价值才被生产出来。因而鲍德里亚把“使用价值”解释为“价值规律的最终沉淀物”,即具体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批评劳动力概念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表达,并由此而得出颠覆性的结论,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并不存在,相反,“正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决定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具体起源以及劳动行为的目的”④。政治经济学的症结在于把自身所生产出来的劳动力概念设置为人类潜能的基础,这种设置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操作完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力概念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和人的解放的基础性概念时,恰恰有助于资本的诡计。

(二)劳动的质与量:量的劳动延伸到全部可能的领域

那么这种“诡计”是如何实现和运转的呢?鲍德里亚认为必须揭示劳动力使用价值以及生产者特有的合理性概念的产生机制。这就是劳动的量与质的辩证法,其背后隐藏了价值的结构制度。这种揭示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二是量的劳动(抽象劳动)升华为支配全部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⑤具体劳动是差异化和不可比较的,抽象劳动则具有量的可计算性质。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概念的二分逻辑反映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他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具有质性规定的劳动力何以产生可计算的剩余价值?正是马克思关于质性的前提预设本身导致不能解释和发现抽象劳动的形而上秘密。劳动的量与质的“分离”本身是劳动的普遍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如马克思把具体劳动看作抽象劳动的基础。通过把质与量进行区分,进而让量(抽象劳动)从质(具体劳动)中脱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地位,量的劳动最终才得以统治世界。通过这种二分,“量的劳动延伸到全部可能的领域”。鲍德里亚把这种延伸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因为意识形态总是根据二元分叉的结构建构自己,正是“在这种‘分叉’的基础上,劳动才真正地被普遍化了,它不只是仅仅作为市场价值而更是作为人类价值被普遍化了”⑥。即是说,这种“分叉”为抽象原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鲍德里亚进一步揭示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辩证法,指出:“如果任何一种类型的劳动都不再支配其他的劳动,那是因为劳动本身支配了所有其他领域。……对特殊劳动的漠不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7 页。
②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③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5 页。
④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8 页。
⑥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7 页。

心,适应了劳动决定社会财富的状态。”①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劳动价值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财富的形式,因而最终无法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方案。

(三)劳动的四个镜像:需要、自由、自然与“生产性”

第一,劳动与需要作为人的双重潜能,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服务自身而生产出来的。

“需要”是马克思解释劳动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概念,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需要概括为人的生产劳动的本质②,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把需要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③。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因为它同具体劳动一样,具有唯一性、差别性和不可比较性的特征,即“质性”。所以需要的本质就是“寻求自己满足的特殊倾向”。这样,需要就被分解为无穷种类的需要,在需要中人们也赋予产品以有用的、主观的目的。鲍德里亚强调,劳动、需要是人类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共享着这一前提。马克思正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来阐发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辩证法,鲍德里亚由此得出结论:“他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④

鲍德里亚的批判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因为需要与劳动之间的互创关系在今天获得了最极致的显现。正因为人有“需要”,所以人通过劳动来满足这种需要,一千种具体的需要就会反过来生产出一千类具体劳动形式。马克思从“需要”这一前提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时,似乎就已堕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因为资本与劳动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本生命的繁衍即增殖离不开劳动,而激活劳动积极性的正是“需要”。这当然是鲍德里亚高明的地方,但他批评的是资本主义的“虚假需要”,即资本在展开过程通过理性化能力挖掘欲望、创造需要,从而实现自我复制即再生产。但“消灭概念”不等于消灭概念所指代的社会现实,作为人之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的“需要”并不为社会变迁所转移和改变,而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中的。

第二,劳动与非劳动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性质,自由是资本主义劳动所设定出来的幻觉。

马克思曾经勾勒过未来社会的自由形态,早期从劳动分工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一种自由活动的状态,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则从自由时间的维度探索人的自由何以可能。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在今天受到双重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伦理学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把劳动看作人的自由本质和潜能的实现的观点本质上是“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看作是自身的目的,看作是绝对命令”⑤。在此意义上,劳动失去了它的否定性维度,被抬高到具有绝对价值的地位,因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它恰好为劳动的痛苦性质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另一方面,作为与劳动相对的自由领域,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所发展出来的游戏说,也同样掉进了形而上学的泥潭中。鲍德里亚认为游戏始终不过是对劳动强制性的审美升华,而非劳动也只不过是劳动力的压抑性反升华。因为劳动与非劳动是二元对立结构的最微妙形式:“对劳动加以剥削,反过来导致对非劳动的痴迷,对自由时间的幻想。”⑥实际上,自由与劳动的二元结构既是现代秩序创造出来的,也是维持现代秩序的一种形式。鲍德里亚认为,这种非劳动“也像在劳动领域一样是强有力的”,而获得的这种自由也只是人把自身当作价值生产出来的虚假自由。因此把休闲看作是自主活动和社会的理想,正好掉进了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幻觉之中。

这些批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的目的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绝对命令,他认为当马克思把人类的价值目的赋予劳动时,正好中了资本主义的诡计。二是马克思陷入非劳动的游戏美学想象中,把“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赋予劳动审美中。鲍德里亚的言外之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非劳动仍然是由劳动、价值规律所生产出来的,即是说,非劳动仍然充当着劳动体系的一部分,仍然受到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操控。尽管自由时间曾经被设想为超越资本主义控制的可能性方案,但最终仍然成为一个未实现的空洞

---

①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1—532 页。

④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4 页。

⑤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6 页。

⑥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21 页。

符号,非劳动的概念最终“仍然作为符号回落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

第三,劳动是对自然加以雕琢的客观改造活动,是主体支配客体的技术抽象。

鲍德里亚认为,把劳动与自然都解放为生产力的这种观念是启蒙哲学的产物。自然被解放为可以通过劳动发掘的生产力,而个人也被解放为自由劳动力。因而,无论是自然还是劳动力都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降格成为“生产的经济要素”和“同一个理性化的两个条件”。因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所陷入的正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思维窠臼,人作为主体通过理性对客体进行规定、塑形和改造,进而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作用下,自然被划分为可被支配和理性化的“好的”自然,以及无法为经济所用的不友好的、灾难性的、污染的等总而言之是“坏的”自然。“任何唤醒自然的东西,都唤醒了对自然的支配。”①同样,劳动力也被二分为能够被剥削的好的正常劳动力,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形成威胁的“坏的”劳动力。鲍德里亚认为这种二分思维根植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本身,即“这些概念普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尤其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②。

与阿伦特一样,鲍德里亚也痴迷于“工匠”作为劳动主体与对象的直接同一状态。封建社会的工匠参与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劳动内含感性自由。“工匠把自己的劳作看作是象征交换关系,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劳动者’,把物品看作是‘劳动的产品’。”③其次,工匠所创造的物品是被丢失、被放弃、被给予、被花费、被分解,而不是“被投资”。反过来说,现代社会生产的劳动产品是被当作生产资料纳入再生产过程,从而以资本增殖和经济增长的目的进行循环利用,因而“只打上了价值合目的性的印记”。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从“劳动”而非“劳作”(work)这个概念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只是完成对政治经济学体系运行方式的解码,即再生产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

第四,反对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试图重新定义劳动概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过专题式探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是以创造或带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劳动,无论是物质性劳动还是非物质性的服务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④,相反,则是非生产性的劳动。鲍德里亚认为总体工人(collective labourer)的出现意味着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了。总体工人与个体工人相对应,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当代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的性质的变化,即不再参与产品的全过程的制造,而只是负责产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劳动者从生产的主体地位退居其次,甚至可有可无了。可见,鲍德里亚把非生产性理解为生产内容的非物质性(非对象化)了。鲍德里亚由此指责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概念没有考虑到资本可能扎根在这种掏空了物质内容的非生产性劳动之中。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生产性劳动,这种依赖恰构成对资本的威胁。而鲍德里亚认为这种逻辑恰好适应了资本的策略,因为资本正是通过非生产性劳动“挫败了‘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危险的确定性,并且开始确立自己真实的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全社会”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这种“二分法”同“劳动与非劳动”一样掉进了形而上学的陷阱之中,并把现代所有劳动定义为“劳动/服务”。也就是说,鲍德里亚把今天的劳动形态理解为服务性的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类似于哈特、奈格里等提出的“非物质劳动”,其特点是产品的非物质化和劳动的非对象化。但“服务劳动”是指任何劳动被退化为非对象化的活动,如身体、时间、空间、智力的投入,其特点就在于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不可分离性。鲍德里亚正是从这个维度认为马克思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预见到“再生产”逻辑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即非生产性劳动、休闲等都成为生产体系自我修复和完善的衍生环节。“休闲像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工厂的劳动像休闲或第三产业一样是‘非生产性的’”⑥。

---

①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39 页。
②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43 页。
③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8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7 页。
⑤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 页。
⑥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35 页。

二、鲍德里亚误解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方法论根源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评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准确理解。很显然,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有“经济学”(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或“人类学”(满足人类需要)的维度。实际上,这种看法本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非马克思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观念。二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维度。鲍德里亚的批评之所以模棱两可,是因为一方面他遮蔽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劳动向度,另一方面,他在误解马克思的同时又把握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特征及其变化。三是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分问题,鲍德里亚恰恰混淆了两者。这三个方面也是鲍德里亚误解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根本原因。

第一,鲍德里亚未能从哲学存在论维度定位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将其片面化和狭隘化为改造自然、满足需要的工具性活动。

要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等概念就不能撇开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都包含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作为哲学存在论维度的劳动是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种维度不是简单地把劳动抽象为财富(资本)的源泉,也不是看作仅为满足人类各种欲望和需要的工具,而是把劳动理解为一种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理解为展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当……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①这是包括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误读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方法论根源。在存在论意义上,劳动不仅使人区别于动物,而且区别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因为这种异化劳动正如阿伦特所批判的把人降格为了“劳动动物”。因此,《生产之镜》的一开篇,鲍德里亚就是从经济学而非哲学存在论的维度来着手批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把劳动片面地理解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把个人作为可出卖的和可交换的劳动力生产出来,而且正是它生产出劳动力的概念,并以之作为人类潜能的基础。”②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才把政治经济学的帽子扣在了马克思的头上。在这种前提下,鲍德里亚进一步从人类学维度把“需要”解释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诡计”,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与需要概念就自然而然被拖进了互相再生产的循环黑洞。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发现不仅在于为劳动奠定存在论基础,而且使得其扬弃了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弊病。一方面,“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之主体性原则,把人之创生和改变世界的主体地位赋予劳动,彻底颠倒了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自然必然性”的消极阐释。所以马克思说:“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③ 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又与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区别开来,而承认人的活动的感性维度即受动的一面。但这种感性又与费尔巴哈的纯粹感性不同,马克思的感性不是动物的纯粹受动性,而是属人的有意识的感性。同样,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遵循着存在论的基本原则,但鲍德里亚对劳动与自然的关系的解读,却是建立在前马克思的哲学基础之上。鲍德里亚错误地以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因而才把劳动概念定位为改造自然的工具性活动,并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归咎于马克思的思想,进而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人统治自然的技术抽象。在这样的逻辑下,鲍德里亚才提出必须打破“劳动的幻镜”,因为他认为“劳动的真理在于它的资本主义界定。从这种界定出发,就建立了劳动的幻象”④。

第二,鲍德里亚忽视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性质,把劳动价值论仅仅当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再现,从而以误解的方式说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真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9 页。

②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8 页。

④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88—89 页。

缺乏存在论革命的视野使得鲍德里亚不能超越经济学的藩篱来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本真内涵,但这并不能回应另一个责难,即:“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①鲍德里亚如此断言的依据有两个:其一,马克思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使用价值都是由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其二,马克思没有看到正是劳动的质与量的区分使得“量的劳动延伸到全部可能的领域”。这同时是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和批判,这种符合现实的逻辑似乎让读者真的认为马克思掉进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现代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交换价值则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所谓质和量的区别也分别指代劳动二重性。但鲍德里亚并不满意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解码式批判,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种描述的理论”。

在对劳动的认识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指出了其积极的维度,如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对需要的满足的延迟,同时,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劳动创造了人,且是确认人的本质性活动。因此这是对劳动的积极的和肯定的表达,而鲍德里亚把劳动理解为慢性死亡的过程,这种否定性和消极解读正揭示了现代劳动过程的本真性质。同样,作为资本主义的事实与运作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现象学的功能,即“还原”出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但鲍德里亚没看到的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黑格尔对现代劳动的非批判态度:“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②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不仅是黑格尔,而是现代劳动本身,即抽象劳动成为统治和支配具体劳动、人类社会生活的绝对力量。虽然鲍德里亚也看到了物体系对人的操纵(“物品几乎成为一个全面性程序的主导者,而人在其中不过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只是观众”③),但他把原因仍然归结为“技术”力量,因此,是技术把我们拖进了拟真的抽象世界。显然,鲍德里亚所作的批判只完成了一半,还未进入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深层次,即对抽象劳动主体化的批判。马克思正要揭示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必然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力量支配和统治着创造使用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具体的感性劳动。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将会蔓延至全社会。因而马克思才会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④。这里被抽象统治着的不仅包括个人的生活世界,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鲍德里亚浑然不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深处潜藏着他对资本权力的批判的深刻洞见,而这一洞见正是建立在劳动批判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在对劳动与非劳动的批判上,鲍德里亚犯了几乎同样的错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实际上是发端于费希特的“自我创造非我”的观念论,即抽象劳动为了延伸自己的控制而创造了非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非劳动就是指闲暇或自由时间的领域。闲暇时间到今天仍然没有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相反,即使是人的自由时间、生活世界,也受着资本的规定和支配。人要么处在消费中,要么处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或者同时深陷两者之间。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中,休闲的消费也掉进了再生产的循环逻辑中。“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⑤应该承认,鲍德里亚对休闲或自由时间的异化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产之镜》,再到《象征交换与死亡》,他都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变化,即:在现代社会,自由时间成为一种符号。在这种符号对人的控制下,人“必须证明的是他的时间的无用性,即时间的剩余,就像作为财富的剩余资本一样”⑥。因此,休闲时间成为象征性的并为资本服务的生产性价值。但又不得不说,这一切早已为马克思的劳动批判理论所揭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⑦显而易见,鲍德里亚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意识形态虚假性,但这种批判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所

---

①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5 页。
③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59 页。
⑤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4 页。
⑥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99 页。

划定的范围。相反,资本或抽象劳动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以太”无时无刻不在为了外化并实现自身而创造自己的对立面。但马克思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他认为资本或抽象劳动同时饱含着矛盾性,即同时生产着反对自己的革命力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将会从内部瓦解资本自身,在这个时候,“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①。

最后,鲍德里亚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混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未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所触发的问题和马克思思想本身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是复数,在广义上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包括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有一个十分巧妙的笔法,即他在批评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等思想的时候,总是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来回切换着使用。这种交叉使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批评马克思的基础理论时,会把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如苏联马克思主义混淆在一起进行批评,指责马克思是在用抽象概念对现实运动进行形而上学解释。以劳动范畴为例,他强调马克思把劳动当作一个抽象范畴投射到对历史的分析之中,而忽视了“劳动一般”的历史性生成和劳动的具体现实性。“在这种抽象性导致劳动(劳动力)的抽象普遍性的同时,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劳动范畴的普遍抽象性以及这个范畴能适用于过去所有社会的幻觉。”②但鲍德里亚在对这种理论的教条化和普遍化进行归责时,使用的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又以‘批判的’帝国主义将这些概念普遍化了,就像其他理论一样。”③这些概念不只是劳动(劳动力),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等。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明确以劳动概念为例揭示过抽象概念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④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历史出场过程的揭示,即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在历史上的分离和资本主义结合,这同时意味着劳动的价值化和抽象化。

另一种情况是在批评马克思的某些具体思想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哲学家和马克思放在一起进行“清算”,甚至是根本不进行区分。这种混乱在批判劳动与非劳动的“游戏论”中最为明显。马尔库塞曾在《爱欲与文明》中,把扬弃异化劳动的游戏(play,又译“消遣”)状态理解为人的劳动与自由的统一的实现。“消遣和表演作为文明的原则,并不表示劳动的转变,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⑤鲍德里亚从马尔库塞的理论出发,批评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含混不清,将其斥之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游戏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实现,是人类行为不断地实现自然对象化和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辩证顶点。”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批评斯密的牺牲论和美学幻想以及傅立叶的游戏说时就早已澄清。马克思认为把劳动的自由当作一种娱乐、一种消遣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浪漫主义想法,“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⑦。马克思同时还分析了这种自由劳动所应具有的社会性和科学性。

那么,这是否是鲍德里亚的有意误解呢?从现实发生的立场看,鲍德里亚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如苏联等的确这样做了,曾经或正在走进一面面无限劳动、无限再生产的“经济发展”的凹凸之镜中。问题在于这顶帽子不该扣在马克思的头上,因为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表过态“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⑧。实际上,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那种把他的理论和思想教条化的实践。《资本论》及其手稿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再生产循环过程的揭示,充分显示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200 页。
②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70 页。
③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2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29 页。
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7 页。
⑥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2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174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0 页。

判在今天仍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此,鲍德里亚的许多深刻洞见与马克思在原则上没有本质的差别,可以说,两位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形而上学批判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鲍德里亚以误解的方式说出了马克思的真理,或者说是以这种“歪曲”的形式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鲍德里亚误解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实践逻辑后果

如果说《生产之镜》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解构性批判,那么《象征交换与死亡》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的尝试。这一建构的理论基础是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的。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目的的逻辑是:先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补充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再通过对生产—劳动概念的批判颠覆马克思(主义),最后试图通过劳动与死亡的象征交换理论重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但是,鲍德里亚的这一改造能否真正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劳动价值理论呢? 这是所有问题的要害。

(一)劳动成为一种抽象“符码”

鲍德里亚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中获得了批判的启示,认为“劳动”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从生产领域延伸和渗透到全部生活领域,成为支配和控制我们的抽象力量。鲍德里亚将这种支配和统治的抽象形式概括为“符号”或“符码”,“符码的狡计在于将自身掩盖在价值之下,或者通过价值而生产自身”①。但符号政治经济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能分析的范围,因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正是建立在劳动概念基础之上。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有必要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不再是劳动建构了这个世界,而是作为符号的劳动征服、解构了劳动自身的历史意义和实体内容,并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这正是劳动符号化的运作机制,而符号化的结果一方面是对应着现实劳动的抽象化,另一方面对应的是人类陷入无限劳动和再生产的循环。这样劳动和生产内容的目的性被摧毁了,劳动和生产变得像代码一样运转,从而脱离了真实。“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②因此,鲍德里亚区分了“生产逻辑”和“代码逻辑”。他认为,一切事物都被吸收进价值领域当作操作变量被编目、被传唤、被促逼着运转,而不是为了生产而被调动,不是变为生产力。最后,无论是人的知识、认知或态度,还是潜意识、革命等成为变量时,意味着“人”的任何真实内容都要受着代码的指令控制和任意改变。

在这种符号批判理论的牵引下,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抽象化进行了批判,即现代人受着抽象命令的支配而丧失了主体性和实体性。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为三个阶段。一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的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二是机器和固定资本占优势的“劳动科学组织”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自动机器体系阶段,“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③。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看到了作为资本的对象化劳动翻转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且“人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鲍德里亚高度赞扬马克思,认为“这句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因为这句话意味着生产过程对劳动主体性的排斥和遗弃。即是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的排斥,人从生产过程的主角退化为配角,如人成为机器体系的零件,甚至被抛弃在生产过程之外。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生产过程的主体地位也逐渐被资本消解。“我们不仅应该和马克思一起说‘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而且应该说‘资本过程本身也不再是一种生产过程’。”④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运动不再绝对地依赖于生产过程本身,后者不再处于前者的中心位置。

这种抽象统治还体现在“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鲍德里亚由此重释了二者之间的辩证法。他认为,当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之后,死劳动就不再仅仅满足于支配和统治活劳动,而是上升到支配一切的绝对优势地位,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即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抽象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寄希望于人类最终会扬弃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鲍德里亚认为这高估了机器与技术的纯洁性,“以为通过生产的某种历史性跳跃,在经过某个关键点之后,死的

---

①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92 页。

②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9—1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85 页。

④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17 页。

劳动可以在活的劳动中超越自身”①。马克思认为,当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化达到某种极限时,资本主义将在自我的运动中扬弃自身,这个“极限”即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关键点”,而扬弃则是“生产的历史性跳跃”。在这一刻,死劳动将抛弃自身作为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成为完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鲍德里亚认为,“死劳动的死亡”意味着具体物之本真内容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一切对象化劳动的内在意义和价值都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运动中被掏空。因而伴随着这种价值的“死亡”,马克思对死劳动(机器)的革命转化愿望必然就落空了。鲍德里亚认为即使生产高度社会化,资本体系的运作基础与生产逻辑也不依赖于具体的物及其所有形式,而成为一种能够脱离“具体”的抽象符码统治着人类。

(二)通过“暴死”拒绝劳动符码的控制

那么,鲍德里亚是如何给出突破这种符号控制的革命方案的呢?他从黑格尔主奴关系中的死亡理论获得灵感,重新阐释了劳动与死亡的关系。工人用工资所兑换的其实是死亡。但鲍德里亚并不是从生理学把这种死亡理解为身体的衰弱,而是认为“劳动是作为一种缓慢的死亡与暴死相对立”②,即劳动是作为延迟的死亡与即时的死亡相对立。因此,在现代社会,劳动唯一的替代物不是闲暇,而是牺牲。因为即使是在自由时间中,抽象劳动也仍然在操控着现代人。鲍德里亚从奴隶的谱系学来说明这种死亡的差异。在过去,战俘是被直接地处死,后来把战俘变成奴隶,最后奴隶也得到解放,而让他们摆脱直接处死威胁的动因“正是为了劳动”。鲍德里亚认为这两种死亡从根本上区分了经济组织和牺牲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前种类型,资本正是通过延迟劳动者的死亡使他们成为在劳动中遭受无限的生命屈辱的奴隶。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重新解读了黑格尔的“死亡理论”。因为在主奴关系中,“对死亡的恐惧”是促使奴隶屈服于主人并不断为其劳动的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资本是通过延迟劳动者的死亡的方式而非即时性的死亡威胁,来把人变成“不断劳动”的现代奴隶。

鲍德里亚给出了十分大胆的策略:通过暴死对抗统治。他认为只要这种死亡的悬置没有消除,权力的统治就不会消除。但如何消除这种死亡悬置呢?“只要交出这一生命,用即时的死亡来报复延迟的死亡,这才构成一种根本的回应,这才是废除权力的唯一可能性。”③这就是通过消极地否定生命的悲观形式实现对资本体系和异化劳动的革命,这种用死亡来实现解放的方式被鲍德里亚称之为“象征交换”。学界关于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的理解,一直以来都是从“礼物交换”的喻义上来解读的。“在象征性交换中,礼物是一个最为切近的实例。物在此不是一种物……确切地说,物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交换价值。已经存在的物所有的是象征性交换价值。”④但在《象征交换与死亡》这里,正如书名所说,象征交换是指劳动与死亡之间的交换,象征交换理论在这里成为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方案。劳动者在暴死那一刻“交换”得到彻底解放的革命性“意义”。因此他说:“暴死可以改变一切,缓慢的死亡却什么也不能改变”⑤。工人也正是在这种缓慢杀死自己的劳动中把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用微小剂量而不是一次性地还给资本,资本也正是通过这种缓慢死亡的方式和策略来使工人不断地处在劳动中,从而消解暴死对资本的彻底拒绝和反抗。

但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通过工资赎买的方式“中和”了这种即时性死亡对资本系统的象征报复。他接受了现象学的某些解释原则,认为与一切感受到的表象(资本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并榨取剩余劳动)完全相反,是资本把劳动“给予”劳动者。他指出,“企业主”(Arbeitgeber)在德语中就是“给予劳动的人”,而“工人”(Arbeitnehmer)则是指“接受劳动的人”。这里的“给予”应该准确理解为设定或建构的意思。实际上,这与马克思的劳动批判理论是一致的。因为现代劳动都是被资本所设定、建构出来的,是资本在外化的过程中所自行展开的环节。但是,鲍德里亚为现代劳动者提供的革命策略就是“拒绝劳动”,拒绝这种象征统治。工资就是资本对劳动实施统治的一种象征补偿,用马克思的术语解释就是将工人拖进无限循环的抽象劳动中。所以,劳动者在消费中所生产的正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力,因

①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6页。
②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54页。
③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55页。
④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0页。
⑤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55页。

而资本把消费变成了它自身的无限再生产。鲍德里亚因此把消费看作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利因素”①。鲍德里亚更为激进地认为,不仅仅是劳动、工资,权力、革命等都应该反过来被理解为资本所给予的,而“对权力的唯一有效反击是把它给予你们的东西还给它,这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实现”②。可见,鲍德里亚仍然把出路诉诸消极的暴死。

(三)剩余价值规律(劳动辩证法)仍然是革命的唯一出路

不得不说,鲍得里亚通过对劳动与死亡关系的激进解读所导出的革命方案与马克思大相径庭。在这种“出路”的巨大差别之间,我们真的只能选择后现代的消极行动吗? 真的只能选择用“暴死”的方式来拒绝资本主义抽象劳动的统治吗?

如果仔细一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大拒绝”的后现代态度并不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一是这种“拒绝劳动”的方式已完全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条真理就是指出“物质生产”是人类的基础活动。尽管,资本已经发展到脱离一般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愈来愈符号化,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物质生产。二是这种“暴死”的拒绝方式除了能够从这种“例外状态”来暴露资本主义的弊病之外,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理想方案。一方面,资本主义害怕的恰恰是劳动力的即时性死亡,因为其结果就是资本失去了继续存活的力量来源。一旦劳动力即时性死亡了,资本主义也就暴露了自身的漏洞和恐怖,从而威胁到自身的存在。所以,资本不会让劳动者死。没有了劳动,资本也就不能得到自身的复制和再生产。所以正如鲍德里亚自己指出的:“在这种象征关系中,劳动和剥削的实体是无关紧要的……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权力从来都不是处死的权力,恰恰相反,是留命的权力”③。因为权力只要控制了人的死亡,现代资本也就可以通过对生存的威胁来达到支配劳动力的目的。另一方面,问题不仅在于资本不会让人死亡,而且还在于人正是“有死”的存在者,才会宁愿屈服于劳动的统治,也不愿意选择用“暴死”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鲍德里亚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体“大拒绝”的革命方式放大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行动原则。

而马克思的革命方案则坚持了这种必然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一方面,劳动阶级要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抵抗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扩大我们的自由时间以及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但鲍德里亚说:“阶级斗争虽然自马克思为其命名而开始存在,但是……被命名之后,其力度便逐渐消退。”④尽管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变成了鲍德里亚所批评的“为了罢工而罢工”,或斗争的远大目标被短期的利益考量所蛊惑,但这本身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拒绝。而之所以革命的胜利迟迟不来,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鲍德里亚等后现代哲学家所不再相信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因此,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服从剩余价值规律,并以劳动辩证法的展开方式否定自身。当然,鲍德里亚也不再相信这种内在论的辩证法的科学性,并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传统坚持普遍性逻辑的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同质化处理。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历史等概念都掉进辩证法的逻辑中了,并强调“辩证法必须辩证地被超越并且废除自身”⑤。虽然鲍德里亚和马克思一样,把否定性和对抗性看作革命的动力,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差异的消失和单一性的循环。因此,全球化事务最终“不再涉及任何对立或否定的价值”,因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所提供的“对抗性体制已不存在”。⑥ 可见,鲍德里亚不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不相信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即不相信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否定自己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劳动辩证法。

马克思不仅同鲍德里亚一样,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对人的

---

①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67页。

②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58页。

③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54—55页。

④ 让·鲍德里亚:《为何一切尚未消失?》,张晓明、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薛法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5页。

⑤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30页。

⑥ 让·鲍德里亚、菲利普·帕蒂:《临界:鲍德里亚访谈录》,戴阿宝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统治,而且给出了扬弃这种抽象劳动的科学方案。这一方案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本立场,把劳动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并且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即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会创造出否定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我们对此已有过专门的论述。① 概括地说,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资本主义必然会抵达自己的生命极限,换言之,剩余价值的生产极限将会使得资本主义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因为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就无法获得再生产,资本也就失去了增殖的空间。尽管这一空间在今天的网络虚拟世界得到了拓展,但网络世界仍然依托于“电脑”物质基础,软件的代码不能离开硬件而运行。鲍德里亚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生产的符号化,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一规律失去作用了,错误地以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只是可随意被定义的符号。而理解这一切的基础都在马克思对劳动的存在论规定之中,即这种活动一定是感性的,而不能脱离感性对象,同时这是一种把人的本质力量(在资本主义是以物理时间的异化形式进行计算)现实化的对象化活动。如果从剩余价值规律来看,今天的非物质劳动的价值都是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鲍德里亚所主张的已经完全符号化了的“价值”依然不能脱离“自然”的基础,只不过像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那样,变得更加神秘而不可琢磨。

一切的问题可能只在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依然强盛。

Why did Baudrillard Misinterpret Marx's Labor Theory

He Yunfeng, Wang Shaoliang

(*Institute of Knowledge & Value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Jean Baudrillard believed that such concepts as production, labor, and value that Karl Marx relied on in hi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had lost their critical efficacy today, because these concepts still fail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hinking method of Western rational metaphysics, thus fall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mirror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Therefore, Baudrillard made a systematic criticism of the labor force, labor duality, labor and nature, labor and needs, labor and freedom, productive labor and non-productive labor. The main reasons why Baudrillard misinterpreted Marx are as follows: firstly, he lacked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arx's concept about labor; secondly, he ignored the dimension of criticism in Marx's labor theory; and thirdly, he confused "Marx" with "Marxism". Baudrillard finally moved towards a negative theory of symbolic exchange along the revolutionary line, that is, he used the method of "sudden death" to resist the symbolization of abstract labor and its control over the human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Baudrillard rejected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his law of surplus value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Marx revealed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abstract labor and its rule over the humans, and worked out a scientific plan to sublate this kind of abstract labor. Marx understood labor as a fundamental force tha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and created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sens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the humankind will create revolutionary forces that deny private ownership and capitalism.

Key words: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ontology; abstract labor;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何云峰、王绍梁:《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重维度及其辩证关系——兼析〈资本论〉中劳动辩证法的革命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2 期,第 60—61 页。